

「國際轉向」-- 敬覆評論

DAVID ARMITAGE

哈佛大學歷史系

史學之進展殊途，有開創新猶者，有舊題新研者，有舊學重構者。開創新猶者，於此三者中最為少見，但重訪歷史課題或重構歷史領域，往往是歷史學前進之動力來源。在某些領域，此種重研重建，可以名之曰歷史取徑之回歸；例如時下所說之「人類全史之回歸」，「長時間歷史之回歸」等等。¹ 在某些領域，此種重研重建宜乎稱之為歷史學的「轉向」-- 如語言轉向、文化轉向、帝國轉向、空間轉向等等。究其實，人們也已如是稱呼。² 在最近一場「歷史書寫的轉向」論壇上，有位年輕史家指出，上述此一史學進展應能循兩條路徑，增進史家之間的對話，以免各說各話。其一，「我們須將各種轉向視為吾人所期待之事，用之以描述或辯論正在發生，或剛剛發生的歷史變化。」其二，「轉向云云，必須用以描述世代之間的變化差異，但不該用以指涉後代優於前代：應是對前代學術的更新或重構，而非完全的取代。」³ 當初我寫思想史中的國際轉向時，內心正是懷抱此種精神態度—強調願景與建構，尊重各種取徑，但也強調必須在既有的史學成就之上築基。我強調，思想史或許能藉由國際轉向而重新界定它與其它研究領域- 包括歷史與非歷史- 的關係，從而既有全新之創新同時有舊題新解的意趣。

¹ David Christian, “The Return of Universal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49 (2010), 6-27; David Armitage and Jo Guldi, “The Return of the *Longue Durée*”, *Global History Review* (Beijing), 5 (2013).

² Judith Surkis, Gary Wilder, James W. Cook, Durba Ghosh, Julia Adeney Thomas and Nathan Perl-Rosenthal, “AHR Forum: Historiographic ‘Turns’ in Critical Perspectiv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7 (2012), 698–813.

³ Nathan Perl-Rosenthal, “Comment: Generational Turn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7 (2012), 813.

為致達上述結論，〈思想史之國際轉向〉一文快速依序瀏覽了過去、現在、未來的國際史與思想史。⁴在上個世紀裡，此二史學次領域曾有過相互吸引與排斥的過程，如今其關係逐漸加深且富潛力。此一學術新方向證實了我十年前的預測：以往史家、政治理論家、國際關係學者、國際法學者之間的對話關係將再次重現。⁵我認為吾人尚有許多事待完成，我在別處稱之為「國際的思想史以及國際化的思想史」(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and an internationalised intellectual history)；此意指，一方面是國際領域的思想性反思，一方面是從國際脈絡從事思想史研究。⁶值得欣慰的是，此次論壇的傑出參與人所提供的精闢評論同時觸及了這兩方面的議題。更令人欣慰的是，幾位評論人均以拙文的精神本貌來看待拙文。以下，我就轉向他們對拙文慨然提出的挑戰性評論。

* * *

包弼德大膽宣稱：「今日我們都已是國際人士。」⁷包教授是我敬仰的哈佛同事，我經常與他一起在研究生課上講授思想史方法論上的空間擴展、時間旅行等問題。在共同授課之時，包教授非常精準地意識到，時空視野的擴展對思想史研究法而言，既充滿挑戰也具多種可能與潛力。他文章開始以無意間收到一期《儒學國際研究》為例，清楚說明上述兩項特質。包教授說：這本集刊的作者「都以外在於儒學傳統的模式談論儒學。」其所謂國際云云，其實是相對於儒學傳統本身。對包教授而言，這其實並非是世界主義，而是種借取論述(a kind of derivative

⁴ The essay translated here appears in slightly different versions in David Armitage, *Foundations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Thought* (Cambridge, 2013), 17-32, and in Darrin M. McMahon and Samuel Moyn, eds., *Rethinking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xford, 2013), 000-00.

⁵ David Armitage, "The Fifty Years' Rift: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1 (2004), 108-09.

⁶ Armitage, *Foundations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Thought*, 7.

⁷ Echoing the British Liberal politician Sir William Harcourt in 1889 ("We are all Socialists now") and possibly also myself, echoing Harcourt, in 2002 ("We are all Atlanticists now"): David Armitage, "Three Concepts of Atlantic History", in Armitage and Michael J. Braddick, eds., *The British Atlantic World, 1500-1800* (Basingstoke, 2002), 11.

discourse)：藉著使用自身傳統以外的標準或規範，冀望擁有更強大的文化資本、更有權勢的優越族群可以對自己施與青睞。但另一方面，誠如包教授的觀察所言，「今日世界之思想生活已無可避免地具國際屬性」，至少，具點雄心的智識份子不只是在對自己的語言同胞發言，也同時想像對國際聽眾發言，正如哲學家不只對其同時代的人發論，也同時對其後代發論。

吾人之思想生活的確是越來越具國際屬性，但我不敢說，此間的國際屬性是「無可避免的」。在拙文的一段卷首語，我引述了法國文化社會學家布狄厄 (Pierre Bourdieu) 的清明之語：「人們常認為思想生活自然而然具有國際性。此說於真理無可稽查。」⁸ 布狄厄認為，文本在旅行過程會遇到一連串的守門人—譯者、編輯、出版商；他們包裝、重編、傳布著以書本或學報形式出現的觀念。(我們或許可以將網路世界裡以非物質形式傳布觀念的人加入守門人名單內。) 當觀念傳布或被傳布而越出其原生脈絡時，他們就有了新的意義。當它們與原始創造之意圖之間的關係因傳佈而鬆動時，它們就創造了原先無所預知的效果。上述此種現象似乎在包教授所舉的例子得到了證明，無論是《儒學國際研究》或姜勤《儒學憲章秩序》—當這些作品送到美國學術圈或以英文印製時，其意義與它們在原生情境裡所具有的意義就大不相同了。⁹ 唯有對其議論之傳佈的物質形式與過程有所領會，我們才能開始了解何以思想生活變成國際化。

誠如包教授在其評論文最後所言，思想生活的國際化可以發生在時間中，也可以發生在空間裡。傳統持續卻也同時旅行著。傳統在旅行之際會與其它傳統混雜、對話。觀念與議論既可將千里之外的社群連結在一起，同時也可以將社群連結達千年之久。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倡跨時間與跨民族的思想史的作法。我提議應該「在觀念中」(*in ideas*)追溯歷史；這是在方法論上對Arthur Lovejoy 及其追隨者

⁸ “On croit souvent que la vie intellectuelle est spontanément internationale. Rien n’est plus faux”: Pierre Bourdieu, “Les conditions sociales de la circul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idées”, *Romanistische Zeitschrift für Literaturgeschichte/Cahiers d’Histoire des Littératures Romanes*, 14 (1990), 2 (my translation).

⁹ Jiang Qing, *A Confucian Constitutional Order: How China’s Ancient Past Can Shape its Political Future*, ed. Daniel A. Bell and Ruiping Fan, trans. Edmund Ryden (Princeton, NJ, 2012).

所倡議的「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所提出的進展方案。¹⁰ 至於跨時間與跨民族的思想史研究之間的最大差異，應該是包教授在其評論文的最後一句話；他希望中國思想傳統可以「進入國際，卻又避免單向的對話。」從全球的視角來看，國際論述自然是多向的對話，雖不必是衝突或不對等的對話。與此相反，我們對過往歷史的接觸方式是單向的；它是跨時間的，但因為我們必然是在現在才得以建構過往，所以我們的接觸是單向的。同樣的，如果歷史源頭本身是民族的、帝國的而非國際的，我們也無法讓它變成國際。因此，非國際主義的類型以及抵抗國際主義就成了思想史研究的主題，因為「某一概念全球化了，但其它概念則否。」¹¹

正是在這樣的觀點下，葛兆光對「國際轉向」的亞洲思想史研究的暗示所做的評論，顯得異常發人深省。他主要關懷之處在於思想史的國際取徑不該忽視或超越「民族」的取徑視野。葛教授問道，國際取徑與民族取徑是否可以共存且彼此受益？他自己從兩方面提供正面的回答。其一素為歐美史家所熟悉：史家永遠必須貼近脈絡。另其一則非為歐美史家所易知，因為正如葛教授所言，他們「個人未親身經驗政治上的巨大箝制與壓迫。」對我們這群在自由民主體制下生活與工作，長期以來，思想自由與學術自主已被保障的幸運者而言，我們的確應該被提醒，在別的社會中，國家的力量遠為廣泛與臨在。在此等情狀下，專注於國家的歷史研究或許是無可避免：在倫理上，此乃必須。

我完全可以感受到葛教授論證的力量，並且同意他的一項觀察：我們不當將民族國家的思想史與更廣泛的方法論上的民族主義相混淆。後者曾經創造過許多歷史書寫，而且仰賴社會科學超過一世紀之久。的確，我在拙文提到方法論的民族主義幽靈，只是將此種民族主義的歷史當成一個領域，並點出，大多數思想史如何避免了此種民族主義的缺點。不過，我願意依據葛教授的評論，再強化我自己論證的邏輯，談談國際轉向對吾人有何好處。以下所論有三端，其一強調有關脈絡之三種不同概念，其二質疑「民族」(nation)與「國家」(state)的統一關係，其三探討常被誤認為延續不變的民族性。

¹⁰ David Armitage, "What's the Big Idea?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Longue Durée*",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38 (2012), 493–507.

¹¹ Samuel Moyn, "On the Non-Globalization of Ideas", in Samuel Moyn and Andrew Sartori, eds.,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New York, 2013), 201.

我是史基納(Quentin Skinner)以前所指導的學生，現在又是他所創立的「脈絡中的觀念」叢書系列的編輯之一，¹² 我完全服膺葛教授對史基納論述的附議：「觀念必須在脈中理解。」不過，我仍需明確指出，有些人，可能包括葛教授在內，似乎有一傾向，即將脈絡等同於「當時代的政治文化」(斜體為我所加)，或認為脈絡云者，只能在或主要在「語言脈絡」中被建構。當然，政治或語言脈絡都極為重要，它們可以回答思想史研究中諸多問題，幫助吾人形成關鍵的研究主題。然而它們並非全部。

政治脈絡之寬窄，係以國家主權之領土為斷。政治脈絡之外，尚有文化、宗教、制度、經濟等等脈絡；其範圍或許比政治脈絡來得廣些，或來得窄些。正如我在該文所指出，脈絡可以是物理與空間的，也可以是語言或概念的。同樣，這些脈絡可以遠超出民族邊界，也可以清楚限定如一個家庭、一座學院、或機構化的空間。從葛教授評論文最後所舉的例子--「佛教翻山渡海跨到日本與韓國」-- 可以看出，他顯然非常清楚上述這些差別。脈絡並非靜態、限定之物；脈絡可能移動、轉變。脈絡受變化牽動，也受造成變化之行為者所牽動。在上述這些不限定、變動的表象下，要建構脈絡來詮釋特定觀念，是一項困難的工作。尤其是如果多重與重疊的脈絡- 有些在空間上極接近我們，有些在時間上相當遙遠—能給予特定的言說意義的時候，情況更為困難。

同樣難以掌握的是民族與國家這兩概念。此二者之間並無必然關聯。此二者之聯結既非常晚出，且相當偶然。有關著作文獻已經汗牛充棟。一個世紀之前，韋伯將二者的關係以相當經典的方式總結道：「民族乃是一情思共同體(a community of sentiment)；此情思能夠在其自己的國家中清楚展現此共同體。因此，民族乃一共同體，並常具有創造屬於自己國家之傾向」。但在韋伯的時代，如此觀念仍相對新穎。¹³ 這帶領我們回到葛教授的陳述：「緣於各國家民族歷史之巨大差異，歷史問題與觀念總是被國家所形塑。」如果葛教授此處之「總是」意指「只是」，我就

12

http://www.cambridge.org/gb/knowledge/series/series_display/item3937510/?site_locale=en_GB, accessed 1 March 2013.

¹³ Max Weber,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ed.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new edn. (London, 1991), 176.

不能苟同。但如果他所謂「總是」是指「在所有時間與空間中」，在現代與前現代，我則頗為疑惑。即使是在中國，我們仍舊應該追問，究竟國家(a state) 與帝國(an empire) 之間是否有其差異。「中國」(China) 的領土在過去幾個世紀中頗有變化；其族群 (peoples) 則在不同的朝代與共和國政權中生活。移民同樣創造出華人離散族群(Chinese diaspora)，其範圍遠超過中國主權(Chinese sovereignty)的領界。我們何時能說「中國」係一國家政體(a state)、國族 (a nation)、帝國、文明、語言共同體、離散族群？我們所探究的中國，究竟是上述種多中國的哪一個？顯然需要更精確的指涉。

「國族」(“National”)脈絡的固定化是短暫的，其在時空中並不具有永恆的延續性。葛教授熱切地提醒我們，思想史家在國際轉向時，仍不該忘記國族脈絡。我並非暗示葛教授此說有誤，我只是強調國際轉向的好處之一是，在以國族為脈絡分析的範疇時，吾人對國族之不證自明，或國族之自然性當採取懷疑之態度。與此相反者，因國際一辭之核心包含國族，我們固然與葛教授一樣，期待「目前的國際思想史研究能夠與國族思想史研究攜手並進」；若非如此，思想史畢竟甚難從事。然而，我們仍需鼓勵專注於國族脈絡的史家們也可以嘗試發掘那些不在國族框架裡的觀念與論述。這些觀念與論述常常若不是因為其運作層次低於，或(有時)對立於國族/國家，就是因為它們超越國族脈絡，比如儒學、佛教、道教等等葛教授在評論文中所提到的例子。我們也當提醒他們Leigh Jenco 所說的「空間邊界。例如屬於民族國家的邊界，係在權力關係中被創造、強化；而我們正是在這種[被給予的]空間邊界裡觀察移動。」無論國族主義者如何期待，國族並非自然之物。去除民族國家的自然外衣，或至少展示它是如何在國際的權力關係中被織造，依舊是史家的須面對的工作，而非只是思想史家的責任。

* * *

世界主義、國際主義、全球主義以及比較研究常被視為國族主義、地方主義，以及其它種思想鄉巴佬主義的治癒良方。然而，正如Leigh Jenco 所言，在政治理論領域裡，「國際化已經證明是歐洲認知模式以及民族國家形式的再肯認，而

非其取代或重新組構。」她強調，政治理論的歷史可以替想要國際化其領域的思想史家提供可資教訓的本事。畢竟，如果國際轉向的結果，只是回歸國族(或回歸歐洲或西方傳統經典或議題)，這豈非轉到更壞的方向？

Jenco 博士推想，思想史的國際轉向尚未前進太遠，而與此同時進展的政治理論，可以提供重要的參考，刺激它更往前邁進。她是對的。一般說來，史家—即便是思想史家—都不若政治理論家那般高度自我省視；主要原因是我們不太有雄心壯志，企圖建立自己的理論。不過，正如Jenco 所言，如果要擴大史學的國際化—以及其進步的「去西方中心」、越來越注意到知識生產地的多元—絕不能不拉近思想史與政治理論之間的對話。不過，她的評論對想要從事此種對話關係的思想史家，倒是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警語。

譬如，我完全不反對她所說，比較政治理論常有對象化、抽象化的傾向，儘管這是比較方法常有的特色，而非政治理論所獨有。比較政治理論經常僵固了它並列討論的不同傳統。例如為了幫助比較，研究者常將原本富有動能與發展的儒學遺續，表述成靜態與教條式的內容。並行的傳統必須從歷史中被抽象化。Jenco 認為，政治理論的國際轉向其實已經對學術界再次肯認西方政治理論的中心地位：它揭露了政治理論的全球糾結，卻未能依循其邏輯，進一步仔細考慮「於其它地區所盛傳的觀念裡的理論特質」。正如Jenco 所言，企圖訴諸脈絡(例如史基納的作品所示)或訴諸理解之視域(Hans-Georg Gadamer 著名術語)將政治理論的內容與意義限定住，只會拘限住觀念，阻止其旅行。¹⁴ 這些方法論其實僵冷掉對話，阻撓了多視域相容的可能。

我也同意Jenco 博士所說的「許多政治理論家認為觀念的空間化，其實是限囿了，而非助長了思想的移動性。」其實這觀點不只為政治理論家所有，許多史家也作如是觀。正是因為如此，我才在〈國際轉向〉一文呼籲應該將脈絡此一概念加以擴大，增其動能。不過，較諸Jenco 博士，我仍較期待「政治理論長久以來的理想的全球思想系譜」不再受到忽視。

¹⁴ James Tully, ed., *Meaning and Context: 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 (Oxford, 1988); 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trans. Joel Weinsheimer and Donald G. Marshall, 2nd edn. (London, 2004).

或許，思想史之國際轉向迄今最具解放意義的效果，正是人們對非西方的系譜與資源的重視加深了。除了Jenco 所提的一些例子（多數取自東亞），我可以再加上 Muzaffar Alam 的回教政治思想研究、Jennifer Pitts 對十九世紀初阿爾及利亞自由主義者 Hamdan Khodja 的研究，C. A. Bayly 對廣義十九世紀印度思想的傑出研究，Pankaj Mishra 的二十世紀亞洲反殖民研究。此外，Karuna Mantena 重新將甘地整合到實在主義政治理論裡，視之為理論與實踐兼具的原創思想家。¹⁵ Mantena多數作品都是新近發表，有些尚且正在進行。我因此特別期待他可以達到Jenco 所說的思想史(以及政治理論)的「真正國際化」：「理論之重新整合須以更廣，更具變革性的方式進行，真正地尋找藏在全球思想空間中的洞見，而非只是在西方地區尋找。」Jenco 博士自己最近有關章士釗政治理論的研究，以及關於跨文化的理論建構，證明她的期待並非空中樓閣。¹⁶

Viren Murthy 深思的評論讓我對國際思想史- 及其孿生兄弟全球思想史- 的光明前景感到信心倍增。拙文結論隱含一個意思-- 從國際轉向到全球轉向是合邏輯的擴展。Murthy 教授簡潔有力地翻轉我的結論道：「全球性為國際轉向的可能性創造了條件」(斜體為我所自加)。Murthy 接著徵募了兩位最早的全球思想史家，黑格爾與馬克思的幫忙，依此提議道，資本主義「可以成為超越化約主義，開闢通往全球的國際思想史之架構。」

Professor Murthy 教授了解到，以資本主義作為思想史的架構，勢必遭遇許多不滿。資本主義不是化約論嗎？難道它不也無可避免的將理念掩抑在物質之下

¹⁵ Muzaffar Alam, *The Languages of Political Islam, 1200-1800* (Delhi, 2004); Jennifer Pitts, "Liberalism and Empire in a Nineteenth-Century Algerian Mirror",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6 (2009), 287-313; C. A. Bayly, *Recovering Liberties: Indian Thought in the Age of Liberalism and Empire* (Cambridge, 2011); Pankaj Mishra, *From the Ruins of Empire: The Revolt Against the West and the Remaking of Asia* (London, 2012); Karuna Mantena, "Another Realism: The Politics of Gandhian Nonviol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6 (2012), 455-70; Mantena, *Gandhi's Realism: Means and Ends in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forthcoming).

¹⁶ Leigh K. Jenco, *Making the Political: Founding and Action in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Zhang Shizhao* (Cambridge, 2010); Jenco, "Recentering Political Theory: The Promise of Mobile Locality", *Cultural Critique*, 79 (2011), 27-59; Jenco, "How Meaning Moves: Tan Sitong on Borrowing across Culture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62 (2012), 92-113.

嗎？難道Murthy所倡議的取徑不是否定了行動者與[人的]自主性嗎？這些反對意見其實已耳熟能詳。而今主要的思想史研究議程之所以被倡導，都因為它們提出與強調物質分析的方法截然不同的方式；在此，我能立即想到的是史基納早先倡導廣義的韋伯方法論，並據以對受馬克思與Lewis Namier 影響的史學研究所提出的爭議。¹⁷ 論辯已進行多時，而Murthy 教授正推開一扇已經開啟的大門。任何跨國族轉向，無論是國際或全球範疇，都必然得同時注意全球與在地的脈絡；至少在處理現代史時應該如此。最近有位心細善文的研究者提出「全球的概念史」(global concept history)一辭。他以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分析手法，處理十九與二十世紀的跨地區運動與觀念的繼受。¹⁸ 近來，國際思想史與全球思想史早已成功地將黑格爾與馬克思當作研究主題。¹⁹ Murthy 對黑格爾何以是位全球史家有簡短、富啟發的說明，而他對資本主義與思想史中的客觀化現象所做的描述，也對此一新興書寫(this emerging body of work)貢獻良多。

Murthy 教授稱資本主義為「我們時代的結構動能」。此說誠是。但早期現代史家們如我者卻想追問，此處所謂「我們時代」究竟可以回溯到何時？正如世界體系理論家以及其他理論家所說，全球化的歷史可以看成是過去五百年來世界各部份--「中心」與「邊陲」-- 逐漸整合的故事。但此一過程相當漸進；在十九世紀之前，此過程難稱得上是全球性的整合。在此意義下，馬克思其實是將當時相對新出的現象已超歷史的方式加以一般化。²⁰ 此外，吾人自可追問更大的問題：全球化究竟是否可以等同於資本主義？我們可以追溯全球化至何時？²¹ 如果我們接受

¹⁷ Mark Goldie, “The Context of *The Foundations*”, in Annabel Brett and James Tully, eds., *Rethinking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2006), 3–19.

¹⁸ Andrew Sartori, *Bengal in Global Concept History: Culturalism in the Age of Capital* (Chicago, 2008).

¹⁹ For example, Susan Buck-Morss, *Hegel, Haiti, and Universal History* (Pittsburgh, 2009); Kevin B. Anderson, *Marx at the Margins: On Nationalism, Ethnicity, and Non-Western Societies* (Chicago, 2010).

²⁰ On Marx as a theorist of globalisation, see especially Gareth Stedman Jones’s introduction to his edition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1848), ed. Gareth Stedman Jones (Harmondsworth, 2002).

²¹ A. G. Hopkins, “Introduction: Globalization—An Agenda for Historians”, and C. A. Bayly, “‘Archaic’ and ‘Modern’ Globalization in the Eurasian and African Arena, c. 1750-1850”, in Hopkins, ed., *Globa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London, 2002), 1–10, 47–

Murthy 教授的建議，將資本主義視為全球性(globality)之前提，而視全球性為國際思想史之背景，我們或許會蹈一種風險，就是在空間極大的研究路徑上太過壓縮了時間。總之，如果在電報、火車、蒸汽船時代之前，資本主義不該被視為全球性的操作，那麼在十九世紀中葉成熟馬可思的時代之前，是否思想史的國際轉向就必然無法被應用？儘管有此一疑問，我強烈覆議Murthy 教授的觀察：「爾來，思想史迭有困境，人們甚至不曾在時空上以全球眼光思考它。」某些國際關係理論家已經朝該方向前進，思想史家也該嘗試進行。²² 關於國際思想史乃依賴全球性一節，我個人尚未被說服；無論此全球性所指者為物質或概念。但閱讀Murthy 教授評論之後，我更加相信，思想史的全球轉向已正式成為吾人領域中的關鍵動向。²³

* * *

在結束本文之前，我得先再次闡明我的論點。容我因此轉向到孫隆基博士的評論。孫博士的評論含有許多對拙文意圖與陳述的誤解；這令我甚至開始自我懷疑，是否拙文表達夠清楚。孫博士雖然可能不知道我曾寫過一本全球思想史的專書，並合編過同領域的專書，他卻推想我並非真的想倡議全球史“not go for” global history。²⁴ 他認為，我有「自家的國際史」（這可能是事實），進而推測我的目的在於「為疲軟的外交史注入新元氣的而努力」（這顯然有誤）。

是否拙文中有任何部分，或我畢生的書寫中有任何一點，可以被解讀成上述這項目標，我自己真是茫然不知。I am at a loss to see how any part of my essay—or indeed anything else I have ever written—could be seen as directed towards that goal. 我

73; Joyce E. Chaplin, *Round About the Earth: Circumnavigation from Magellan to Orbit* (New York, 2012); David Armitage, “Is There a Pre-History of Globalisation?”, in Armitage, *Foundations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Thought*, 33–45.

²² Most notably, Jens Bartelson, *Visions of World Community* (Cambridge, 2009).

²³ Compare the essays in Moyn and Sartori, eds.,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²⁴ David Armitage,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 Global History* (Cambridge, Mass., 2007); Armitage and Sanjay Subrahmanyam, eds., *The Age of Revolutions in Global Context, c. 1760-1840* (Basingstoke, 2010). See also Jaap Jacobs and Martine van Ittersum, “Are We All Global Historians Now? An Interview with David Armitage”, *Itinerario*, 36 (2012), 7–28.

以為拙文已經清楚表達，我的主要書寫身分就是一位思想史家。畢竟，拙文的標題是「思想史的國際轉向」而非「國際史的思想轉向」（雖然此一研究徑路不惟可行，甚至此其時矣）。²⁵ 我現在不是，也從未曾是一位外交史家。對於「織編各種相關縷帶，重新框裱國際關係領域」，我從未措意過，無論這句話真正意指為何。我的意圖很簡單，就是鼓勵思想史家能從近年史學研究的國際化現象裡，汲取靈感，以利多方擴展其研究徑路。其他評論者均頗能掌握我的意圖，因此我確信，造成孫博士的誤解，不完全出自我本人的疏失。

孫博士相信學術分工涇渭分明，且糾結問題不多；他並相信許許多多的歷史問題都已被解決，因此無須再多探。我但願自己能有孫博士般的信心。如果在西元兩千年前真已有國際建置的思想史作品，我會驚嘆並願意傾聽。當然，國際機構作為歷史研究對象由來已久。但就我所知，一直到最近才有思想史家，或應用思想史方法的國際史史家對此進行研究。²⁶ 孫博士宣稱道，國際思想家如Norman Angell 與 Hannah Arendt，一路到 Leonard Woolf 與 Alfred Zimmern 都稱得上是國際關係建置裡的「最高票價」(standard fare) -- 再次，我很想知道出處為何。他又宣稱，有關這些人的「思想傳記已經在位了」；暗示吾人無需再次對他們進行研究。如果此說為真，那麼那些現在還在努力從後代的傲慢中發掘、重現這些人的國際思想的一批學者，應該是還沒收到這消息。如果孫博士真的認為，對「移民、離散社群、流行病投以關注」只消「相對簡單地再造」國族史家就可以了，那他對史學同行們的才能所懷抱的信心顯然遠超過我所有。但願國族歷史的國際化是如此簡易，那麼所有的國族史都可以按心中的跨國現象來書寫。很遺憾，至少現今為止，情況遠非如此。

孫博士同時批評我道，我一方面因著看輕國族而「縮小」了歐洲，另一方面又將啟蒙運動給地方化、本質化了。Dr Sun also takes me to task for, as he sees, it

²⁵ Duncan Snidal and Alexander Wendt, "Why There is *International Theory* Now", *International Theory*, 1 (2009), 1–14; Thomas W. Zeiler, "The Diplomatic History Bandwagon: A State of the Field",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95 (2009), 1053–73.

²⁶ In addition to the works cited in my original article, see now also Mark Mazower, *Governing the World: The History of an Idea* (London, 2012), and the recently launched United Nations History Project website: <http://unhistoryproject.org/index.html>, accessed 1 March 2013.

“diminishing” Europe by downplaying the nation while at the same time localising and essentialising the Enlightenment. 我不確定孫博士的指控的真正意思，不過我倒是確定，這些指控乃建立在一連串不合理的推理，在我論文中無法找到基礎。我無法明白，何以「減消『國族』就是減消歐洲」。其實，對國族作為歷史的唯一單位，抱持懷疑態度者，在歐洲境外也所在多有。正如孫博士自己也提到杜贊德之《從國族中拯救歷史》(Prasenjit Duara's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1995)，正可為明證。²⁷ 我也從未認為啟蒙運動乃「在時間與空間中可以限定的巨石」。同樣的，我實在看不出拙文何處可以看出我如此相信。我嘗言：「習以空間思考的思想史家在回答『何謂啟蒙？』時，應該開始追問『啟蒙在何處？』」我之所言，不過是從新近研究觀念之流通、思想建置之地理分布、啟蒙思想之跨國族，甚至全球的接觸(reach)所產生的豐富文獻加以簡要地摘述而已。拜社群關係分析與視覺資料等等之數位化之賜，上述作品更見成長，例如在卡內基大學裡所建置的《法蘭西斯培根的六社會‘階觸’》(*Six Degrees of Francis Bacon*)資料，在麻省理工學院的《皇家學院的比較》(*Royal Society Comparative Trajectories*) 在史丹佛大學的《文人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Letters*)、在牛津大學的《知識文化》(*Cultures of Knowledge*)，以及荷蘭多處研究機構所共置的《知識流通》(*The Circulation of Knowledge*)。²⁸

此一新興學術既不限囿啟蒙運動，也不加以「本質化」。大不相同的，它強調啟蒙的移動性與多樣性，並強調其泛歐洲與跨歐洲的特質。²⁹ Any reading of this

²⁷ 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1995).

²⁸ <http://sixdegreesoffrancisbacon.com/>; <http://dataminding.org/Network8/index.html#>; <https://republicofletters.stanford.edu/>; <http://cofk.history.ox.ac.uk/>; <http://ckcc.huylgens.knaw.nl/>, accessed 1 March 2013.

²⁹ In addition to the works cited in my original essay, see, for example, John Robertson, *The Case for the Enlightenment: Scotland and Naples 1680-1760* (Cambridge, 2005); Charles W. J. Withers and Robert Mayhew, “Geography: Space, Place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Journal for Eighteenth Century Studies*, 34 (2011), 445–52; Mayhew, “Geography as the Eye of Enlightenment Historiography”,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7 (2010), 611–27; Sebastian Conrad, “Enlightenment in Global History: A Historiographical Critiqu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7 (2012), 999–1027; Caroline Winterer, “Where is America in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9 (2012), 597–623; Anthony Pagden, *The Enlightenment—And Why it Still Matters* (Oxford, 2013).

任何人閱讀這些學術都可以告知孫博士，它並非在「在國族之上豎立更上層的單位，並加以超穩定化」，而是利用比較與連結的方法，揭露啟蒙觀念在其間流傳與實踐的各式各樣的社群，包括國族的，次國族的，與超國族的社群。在此一面向上，我附議一位當代全球史家的結論；他說，正是因為「全球流轉、翻譯、跨國族的合作生產，使得啟蒙運動成為了它自身所冀求的普遍與世界性現象。」³⁰

究其實，在孫博士寫下「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素來與普世的文類」時，他自己正犯了超穩定與本質論的錯誤。因為這麼說，好似這些複雜而內部自存爭議的傳統沒有脈絡，卻有統一的內容。孫博士在評論後半段應用上述這些客體化的觀點分析五四運動——在國族轉變的時間下的系列國族運動。他將五四運動與更廣泛的一九一九年的「左派」「右派」極化一起審視，卻沒有提供任何解釋模式以便將德國、義大利、俄國、日本、中國、美國的事件串聯起來。究竟他是要提出因果關係呢，還是比較框架？抑或認為這些事件只是一組偶然？

孫博士並未(如Murthy 教授一般)告訴我們如何回答這些問題，卻只告訴我們「不要」怎麼做。他提出直截反對拙文的觀點：我們不該問「觀念是如何被生產、如何旅行、誰在銷售它們，誰在消費它們」。他誤指這是「物質主義」的方法論；而他唯一的對立提議是他所謂的「詮釋學」式處理方式。就我所能理解，此處「詮釋學」意指讓不精確的訴諸遙遠的「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之典範來加以引導。值得慶幸的是，我們尚有更富啟發而扎實的五四運動研究；它們或許對歷史關聯性更加注意，使得一九一九成為跨國族，甚至全球交換的特別的時刻。³¹雖多半係出自熟悉思想史的國際史史家之手，而非採取國際轉向的思想史家之所為，此類作品為思想史的全球化這一更宏觀的課題提供了最佳的導引。在此面向上，它也同

³⁰ Conrad, "Enlightenment in Global History", 1027.

³¹ Erez Manela, *The Wilsonian Moment: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igins of Anticolonial Nationalism* (Oxford, 2007); Cemil Aydin, *The Politics of Anti-Westernism in Asia: Visions of World Order in Pan-Islamic and Pan-Asian Thought* (New York, 2007); Mishra, *The Ruins of Empire*, 184–215.

樣回應了Murthy 教授的重要提問：「為何有些觀念」，如革命、國族主義、自決等等，「可以在特定時間下成為全球性的觀念？」³²

* * *

對於所有發表人所提出的富刺激性的評論與批評，我由衷感謝。他們已經幫助我在思考國際轉向所帶給思想史、國族史、政治理論的挑戰時，可以想得更廣。我同時希望也能因此想得更細緻些。他們警敏的建言，代表他們已從拙文基礎上往前更加邁進了。拙文的寫作係從我個人的條件立場出發；包弼德常稱之為「地中海」思想史，也就歐洲與美洲的歷史-- 雖然我也的確試著交代其它地理領域裡的新近[史學]發展。此處只提一個概觀，它與歐洲思想史的國際轉向的意涵直接相關，但顯而易見地，但顯然無法涵蓋今日世界對史學寫作態度的複雜轉變及其衍生意涵。³³ 這群評論者都是亞洲思想史家，其觀點與視角各殊，卻集體地成就了拙文所不達到的境界：他們本身就是思想史的國際化。如果拙文的整理與分析，這點綿薄之力確實有助於此次史學對話所帶出的進步，我會更有相信，我國際轉向已經讓我們轉向更佳之境。

³² Compare Cemil Aydin, “Globalizing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Idea of the ‘Muslim World’”, in Moyn and Sartori, eds.,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159–86.

³³ The essay was first presented at a 2010 workshop on “Rethinking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reconsidering the field almost thirty years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Dominick LaCapra and Steven L. Kaplan, eds.,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Reappraisals and New Perspectives* (Ithaca, NY, 1982).